

金其桢 著

# 中国碑文化



大開元寺興致  
 唐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於延慶殿建金剛道場之次  
 玄宗皇帝問勝光法師曰佛於眾生有何恩德至使捨君臣父母而  
 於佛說者有據朕嘗聞說者無據朕嘗除滅法師答曰佛於眾生  
 越天地明鑒日月義極君臣親過父母 玄宗再問火地日月造  
 功父母君臣地民之事何將佛德勝於此耶法師答曰天無道不  
 地非教不能蓋日月則光明暗日月則夜朗蒼生皆臣之見君王若  
 臣當  
 三  
 文貞祐四年九月初二日弘教大師賜紫僧惠  
 開元皇帝祠壁必有所據未唯探討虛歲月漫久所收功德  
 之真石庶後之來者有以是美寺之致致焉昔  
 大元延祐六年歲次己未正月 日為碑碑刊列於此

重慶出版社

上篇

碑文化发展史略



## 一 碑的起源和繁衍

中国的碑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碑究竟始于何时？弄清楚这个问题，关系到确定中国碑文化起始的源头，因此是深入进行碑文化研究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根据对我国古代典籍记载的研究考溯，碑并非如有些意见所说始于秦代的刻石或汉代的墓碑，而是早在春秋时期即已有之。

汇编了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的《仪礼》，是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专家考定为战国初期至中叶间成书，其中就有关于碑的记载。《仪礼·聘礼》曰：“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东汉著名学者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礼记》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大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所记儒家经典，相传为西汉学者戴圣编纂，全书共有四十九篇，也有不少关于碑的记载。诸如《礼记·祭义》曰：“祭之日，君牵牲，穆答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疏：“君牵牲入庙



门，系著中庭碑也。王肃云，以纆贯碑中。”《礼记·檀弓下》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后四角竖之，穿中，于间为鹿卢（辘轳），下棺以纆绕。天子六纆四碑，前后各重鹿卢（辘轳）也。非石而亦曰碑，假借之称也……”《仪礼》和《礼记》的这些记载及郑注、孔疏都清楚地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碑，当时的碑共有三种：一种竖在宫廷院内，用以测量日影计时；一种竖在宗庙里，用以系拴用作祭祀用品的牲口；一种竖在墓穴四角，上有穿孔用以安装辘轳，牵引绳索将棺材放入墓穴中。

史称“五经无双许叔重”的汉代著名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碑，竖石也。”汉代著名训诂家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云：“碑者，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他们的这些解释，与《仪礼》、《礼记》的记载及郑玄的注、孔颖达的疏是相一致的，是对《仪礼》、《礼记》的记载和郑注、孔疏的有力印证。

明代学者徐师曾在《文体明辨·碑文》中阐明：“按：刘勰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秦始皇刻铭于峰山之颠，此碑之所始也。然考《士婚礼》‘入门当碑揖’，注云：‘宫室有碑，以识日影，知早晚也。’《祭义》云：‘牲入丽于碑’，注云：‘古宗庙立碑系牲。’是知宫庙皆有碑，所为识影、系牲之用。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则碑之所以来远矣。而仿效刻铭，则自周、秦始耳，后汉以来作者渐盛。”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其所著《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中指出：“碑，用以刻辞，果始自何时？曰，始于东汉之初，盛于恒、灵之际，观宋以来之所著录者可知矣。”

很显然，尽管《仪礼》、《礼记》中所说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碑，不论是石碑还是木碑均很粗拙，其形制和用途也均与后世的

## 上篇 碑文化发展史略

碑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认其是最初的原始的碑，它是后世的碑的始祖。后世的碑不论其有刻字，有图案，有一定的形制，如何的炫丽精美，都是由原始碑进化、演变而来的。把开始在碑上刻字即产生碑刻，与碑的产生混为一谈，将刻有文字的碑的产生视为碑的起始，而无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即已有之的用作测量日影计时、系拴牲口和牵绳下棺的无字“竖石”是碑的始祖，是最早的原始碑，将它们排斥于“碑”的范畴之外，显然是不妥的。正如今天，不论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何种高度，我们仍不能因此而否认坚韧锋利无比的现代钢斧，是由石器时代人类始祖所发明的粗拙的石斧演变、进化而来的一样。那种把后来历史演变才在无字“竖石”原始碑的基础上发展产生的有文字的碑刻，视为碑的起源的看法，显然是忽略了事物起始的源头，犯了以“流”代“源”的错误，似不足取。

刻有文字的碑的兴起是在汉代，但这并不是说汉代以前没有石刻文字，只是在汉代以前石刻文字不称为碑，而是称为“刻石”。关于这一点，清代著名学者王筠在《说文释例》中亦曾作过明确的阐述，指出：“秦之记功德也，曰立石，曰刻石。其言碑者汉以后之语也。”从无字、无一定形制的“竖石”原始碑，发展为汉代有“刻辞”、有一定形制的碑，经历了一千多年漫长的演化过渡时期，而“刻石”即是这一演化过渡时期中碑的主要表现形态。

所谓“刻石”就是将文字刻在石头上，换言之，也即刻有文字的石头，故人们也往往称之为“石刻文字”，简称刻石，亦称石刻。

关于刻石纪事，在我国先秦时代和秦汉时代的文献古籍中均有确切记载，诸如《墨子》中就有“古者圣王……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的记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有“古之帝者……犹刻金石以自为纪”的记载。而这一时期之所以会出现“刻石”，考其原因，大约主要一是随着人们社





会活动的日益增多和社会事业的日益发展，需要记载下来的事情越来越多；二是随着封建礼制、观念的日益发展和人们对名誉地位的日益看重，希望将功德记载下来以夸耀昭示于世的人越来越多，诚如东汉著名学者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所说的那样：“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原先，人们用以记事、纪颂功德的是甲骨和青铜器，其数量颇为有限，且较为昂贵，这时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相比之下，石头的来源却非常丰富，取材方便，价格低廉，且质地坚硬，与甲骨、青铜器一样能垂之久远，因而在石头上刻字以记事、纪功、颂德、纪念便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乃至到后来，原先仅仅用来测量日影计时、系拴牲口、牵绳下棺的无字“竖石”原始碑，也根据人们的需要而被刻上了文字，以作更多的用途，达到“刻石立铭，以示后昆，亿载万年，子子孙孙”的目的。这一点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碑文》中作过论述，指出：“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则碑之所以来远矣，而仿效刻铭，则自周、秦始耳……皆因庸器渐阙，而后为之，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也。”

经过漫长的“刻石时期”，碑从最初的没有文字的“竖石”原始碑，演进为刻有文字、有一定形制的碑。而刻有文字、有一定形制的碑经过长期的演进和发展，又逐渐繁衍成为一个成员繁多、规模庞大的碑家族。今日我们所说的“碑”，包含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内涵。从狭义来讲，它只是许多石刻文字种类中的一种，是指那种刻有文字、经过精细磨制加工、有一定规格尺寸和形制的长方形立石；而从广义来讲，就如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所说的：“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也就是说，泛指各种种类、形制的石刻文字，即凡石刻文字统称之为碑。而将石刻文字统称为碑，清叶昌炽在《语石》中又指出：“当是汉以后始。”这也就是说，自“汉以后”演进发展到清代，碑的含义已引申、扩展为刻石、碑、碣、摩崖、墓志、刻经、造像记、塔铭、石阙铭、

## 上篇 碑文化发展史略

题名、桥栏桥柱题记、井栏题记、祠堂（享堂）纪事、墓茛（刻于石上、埋在墓中的买墓地的契约）、界石、画像题字、石刻字帖等一切有文字的石刻和线刻图画碑的总称。

在上述广义的“碑”的各类石刻文字中，“碣”是“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品种和阶段。关于“碣”的名称的由来及碑、碣的区别和联系，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作过不少解释和阐述。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碣，特立之石。”“碑，竖石也。”可见他对碣和碑的看法并没有多大差别，碣和碑基本上是一类东西。唐代封演在《封氏闻见记·碑碣》中说：“碣亦碑之类也。《周礼》：‘凡金玉锡石碣而玺之。’注云：‘碣，如今题署物。’《汉书》云：‘瘞寺前碣著其姓名。’注云：‘碣，杙也。椽，杙也。椽杙于瘞处，而书死者之姓名。碣音揭’。然则物有标榜，皆谓之碣。郭景纯《江赋》云：‘峨眉为泉阳之碣，玉垒作东别之标’是也。其字本从木，后人以石为墓碣，因变为碣。《说文》云：‘碣，特立石也。’据此则从木从石，两体皆通。”在《后汉书·窦宪传》里班固的《登燕然山铭》中有“封神丘兮建隆碣”句，李贤注云：“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辞海》对此解释说，碣即是“圆顶的碑石”，并进一步说明：“古人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圆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叫‘碣’。”“后世碑碣名称往往混用。”摩崖是广义“碑”中数量最多的一种，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对摩崖所作的解释是“摩崖者，刻于崖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辞海》的解释是：“在山崖石壁上镌刻文字叫‘摩崖’。”

上述，阐明了碑与刻石，石碣、摩崖相互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由此可知刻石、石碣、摩崖从广义上来讲都属于碑的范畴，是无一定形制的碑，它们既是无字、无一定形制的原始碑向后世有刻字、有一定形制的碑进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它们又是碑的两个分支。尽管自后世有一定形制的碑





盛行，刻石、碣的形制渐衰、摩崖也相形见绌，但它们依然以自身的特有功能和价值，作为碑的特殊的独立形态被保存和延续下来，和有一定形制的碑一起混用。很显然，如果将刻石、石碣、摩崖与碑割裂开来，乃至仅仅将有刻字、有一定形制的碑视为碑，而将刻石、石碣、摩崖排除于碑之外，显然是片面的，是不符合碑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客观事实的。所以，研究碑文化决不能仅仅只研究有刻字、有一定形制的碑，而必须从广义的视角来研究整个碑的大家族，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的碑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至于“岩画”，尽管其从最广泛的含义上来讲也属于“石刻”范畴，但它与碑文化研究的对象摩崖石刻文字，分属石刻中的两个不同体系，已超越碑文化研究的范围，故本书不加论及。

## 二 胚胎孕育中的先秦碑文化

先秦时期是中国碑的胚胎期，也是中国碑文化的萌芽期。在这一时期，除出现了的“识日景”的“宫中之碑”、“丽牲”的“庙中之碑”和“下棺”的“墓所之碑”这三种无字的“竖石”原始碑外，随着中国文字的发育成熟，坚硬的青铜、铁制雕凿工具的日渐广泛应用，和人们社会活动的日益增多，需要记载的事情越来越多，最早的石刻文字也随之应运而生，出现了与无字“竖石”原始碑相应的有刻字但无一定形制的另外两种原始形态的碑——刻石和摩崖石刻。

历来相传为先秦的刻石和摩崖有十余种：《岫嵎碑》、《红岩碑》、《坛山刻石》、《弇山刻石》、《比干墓碑题字》、《延陵季子墓碑》、《周秦间刻石》、《锦山摩崖》、《蜀古篆碑》、《峰山古刻》、《中

## 上篇 碑文化发展史略

山国河光刻石》、《石鼓文》、《诅楚文》、《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江西广昌古源石刻“天书”》、《浙江仙居蝌蚪文摩崖》等。但据考，这些相传中的先秦刻石、摩崖，并非都是真正的先秦时期的，它们之中有只有传说，但从来无人见过实物或拓片的子虚乌有者；也有有实物、有拓片却是后人的假冒伪刻者；也有字迹诡怪难辨、无法确定确切年代者；但也有经过深入的考古研究，得到确认的真正的先秦时期的刻石。只有对相传的这些先秦刻石分清良莠，去伪存真，才能使真正的先秦刻石、摩崖这一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放射出绚丽的光彩。

### 坛山刻石

根据查考，此石原在河北省西南部赞皇县的坛山上，故名。石上刻有篆书“吉日癸巳”四字，笔力颇遒劲，相传为公元前 976 年至公元前 922 年之间周穆王所刻。此石早已不存，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 年）刘庄命石工凿取其字，珍藏于州衙，后又辗转入自己家中，但此摹刻本也已不存，现在赞皇县孔庙里存有南宋重刻本。根据对其刻字书法进行考证，专家们认为其书法近似唐代李阳冰。宋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在《金石录》中对此石的评价是：“按穆王时所用皆古文、蝌蚪书，此字笔画反类小篆。又《穆天子传》、《史记》诸书皆不载，以此疑其非是。”据此，可以基本断定此刻石并非真正的先秦刻石，系后人附会之伪刻。

### 弇山刻石

根据查考，此石即是南朝时梁朝著名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秦始皇刻铭于峯山之颠，此碑之所始也”所指的刻石。弇山在今甘肃省，又名崦嵫山、弇嵫山。据先秦古书《汲冢书》之一《穆天子传三》记载：“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兀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此事在《山海经·西山经》中也有记载。然而既无人见过此刻石，也无拓片传世，故究竟是否真有一刻石，值得打一个问号。

### 比干墓碑题字

根据查考，此石在河南省汲县，上有隶书四字，相传为孔子所书。但历代学者考证后认为此石是后人伪刻，因隶书在秦代才开始有，孔子根本不可能写隶书。宋代秦观考证后认为此刻石题字系出自唐人之手。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断然否定此刻石题字为孔子手书，在《语石》中提出质疑：“《比干墓字》岂宣圣之遗迹？”据此，可以基本断定此刻石并非真正的先秦刻石，而是后人伪刻。

### 锦山摩崖

根据查考，此摩崖石刻在朝鲜庆尚道，字迹极为难辨，无人能识，有的人非常牵强附会地从石上考释出“上丁其子作洪范”七个字。朝鲜人相传为《秦徐寿题名》，有的人认为是商代箕子所书。清浙江绍兴著名篆刻、书画家赵之谦考证后认为此说不可信，他在《补环宇访碑录》中认为此刻石荒怪不类文字，疑是石裂之纹。清叶昌炽《语石》认为：“箕子就封之文，出于罗丽，半由附会，于古无征……”据此，可以基本断定此刻石非真正的先秦刻石，系后人附会之作。

### 峰山古刻

峰山古刻据《文物》1957年第9期载，系近人刘子衡等人发现于山东邹县峰山盘龙洞内，石上刻有古奥文字3行，共计22字（图1）。刘子衡、王献唐认为是战国时代的刻石。但有关学者考证后认为，此刻石气息不古，不能确定其是否是先秦刻石，即使是先秦刻石，其刻字时间也当在“石鼓文”之后。

### 周秦间刻石

根据查考，此石原藏于山东潍县陈氏，石上所刻为篆书，正面2行，每行8字，侧面3字。清末民初考古学家罗振玉在《石交录》中说：“潍县陈氏曾藏一石，长建初尺约四寸，广不及半……文字精绝，真周、秦间物也。顾陈氏矜惜，不以示人，间于金文拓本中见之，初不知其为石也。近印《松贞堂吉金图》附载卷末，世人始知有此石刻。此不仅为寒斋镇库物也，人间瑰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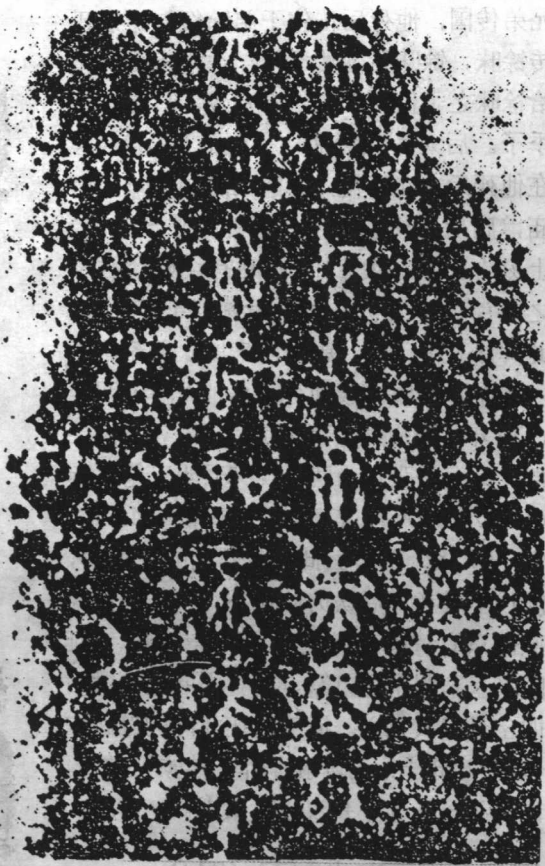


图1 峰山盘龙洞古刻

### 延陵镇季札墓碑

根据查考，此碑在江苏省丹阳县南门外延陵镇季子庙。季札系春秋时吴王寿梦之第四子。寿梦死后，传位于长子诸樊，诸樊欲以

兄弟传国，他死后传位于弟馮祭，馮祭死传馮味，馮味死欲传季札，季札不受，让给馮味之子僚。季札封于延陵，故称延陵季子。后人为颂扬他让王位的高风美德，在他死后立庙奉祀，共建三庙，现只存南庙，庙后为季子墓，此墓碑即立于庙前，上刻十个篆书大字：“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字大径尺，故亦世称《十字碑》。此碑原石早已佚，唐宋以来屡次翻刻。唐玄宗李隆基曾命殷仲容重摹，大历十四年（779年）润州刺史萧定重刻于石，下有吴郡大理司直张从申跋。现碑系明正德六年（1511年）六月重摹上石、碑高2.45米，宽1.07米，圆首。此碑相传为孔子所书，历代学者考证后认为此说不可信，并认为原碑只有“呜呼有吴君子”是古篆，“延陵之墓”四字是方篆、两者不同，怀疑后四字是汉人篡入。清王澐在此碑的题跋中认为：“此十字必非孔子作，然篆法敦古，即非孔子，亦不是汉以后人书。”

## 中山国河光刻石（图2）

根据查考，此石亦称《公乘得守丘刻石》，于民国初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墓葬地发现，为天然河卵石。此刻石原在河北平山县前七汲村田野，30年前被该村人刘喜梅运到家作凳子用，1974年河北省文物考古队移至中七汲村第四发掘队。



图2 中山国河光刻石

经专家考证鉴定为周朝中山国（前8世纪至前296年）遗物，系当时为中山国国王监管鱼池和看守陵墓者所竖。石上无年月。石高90厘米，宽50厘米，厚40厘米，上刻古篆两行，每字寸余，计20字。经专家考释，其文为“监罾尤（圉）臣公乘得守丘兀（其）白（旧）灑（将）曼敢谒后未（傲）贤者”，书法古拙，其气息近于东周铜器铭文。中山国是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重要诸侯国，其文化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又保留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特征，这一特点在河光刻石上有明显的反映。河光刻石的字迹既显示出书法技巧渐趋成熟，又表现出平淡、自然、古拙、简洁、朴素，字迹线条多为平直，绝少修饰性，结字宽厚，欹侧随意，自成章法，风规朴实无华。这充分体现河光刻石是将铜器铭文应用于石刻文字的初期阶段的作品。

### 诅楚文（图3）

据考证为战国中期秦国刻石，内容为秦王诅咒楚王，祈求天神克制楚兵复其边域，故后世称之为《诅楚文》。至于究竟是何年代、哪一位秦王所刻，尚无确切定论，一种主要的看法



图3 诅楚文



认为《诅楚文》是周显王四十一年至周赧王四年（前 328—前 311 年）时，由秦惠文王所刻。《诅楚文》刻石共有三块，都发现于宋代。其一是宋仁宗嘉祐年间在凤翔开元寺地下所得的“巫咸文”，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在《凤翔八观》中咏吟过此石，全石共 326 字，宋徽宗时将此石取归御府；其二是宋英宗治平年间渭河地区一个农民在朝那湫（今甘肃平凉县境）耕地时发掘所得，称之为“大沈厥秋文”，全石共 318 字；其三是先由蔡挺所得，后藏洛阳刘忱家的“亚驼文”，全石共 325 字。原刻石在宋时即已亡佚，现在所见的诅楚三文印本均非原石原拓，而是经后人整理，重新摹写的。据郭沫若《诅楚文考释》考证，其一、其二两块确系战国时期秦国刻石，为当时秦、楚两国交战时，秦国诅咒楚国的檄文，其三“亚驼文”则系宋人伪刻。郭沫若这一观点得到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和赞同。这一见解在宋代的文献记载中也得到了印证，宋刻本《绛帖》、《汝帖》仅收其一、其二两石，而未收“亚驼文”。

### 石鼓文（图 4、图 5）

清叶昌炽《语石》谓其“非李斯以下所能作，自是成周古刻，海内石刻，当奉此为鼻祖”，是中国现存的最早文字刻石，有“刻石之祖”之称，同时也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帝王纪事刻石，因文字刻在鼓形的石上而得名。石鼓共有 10 个，系用 10 块石质坚硬的青黑色花岗岩雕凿而成，其形制为四围圆，中间微侈，底大而平，顶圆而稍尖，上狭下大。10 鼓的大小并不规则，高度 45 至 90 厘米不等，直径约 60 多厘米。每个鼓上都用籀文（大篆）环刻着一首四言韵文诗，连续 10 鼓共 10 首诗，每首十八九句不等，形成了石鼓文组诗。根据历代学者考证，10 鼓每鼓约刻 70 字，直列 9 至 15 行，每行 5 至 8 字不等，10 鼓总计刻字在 650—700 字之间。但到唐宋时已残损，据宋代欧阳修所见，当时已仅存 465 字，后又历经千年磨难，现 10 鼓中有一鼓已一字无存，另 9 鼓也

严重磨灭残损，所存仅 270 余字。

《石鼓文》唐以前从未见过著录，系唐初发现于陕西雍县（前为陈仓县，今陕西省凤翔县）南 10 公里处的三畴原，唐著名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记载：“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与古文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叙（周）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县。”又云：“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据考，“石鼓”之名最早即始于此。《石鼓文》也由此而被称为《陈仓十碣》、《陈仓刻石》。又因石鼓文辞中有“汧”字，“汧”即汧源，系秦襄公都府，在秦雍地，故《石鼓文》又被称为《汧阳刻石》、《雍邑刻石》。前人所考《石鼓文》所刻十首诗记述秦国君游猎之事，故也称为《猎碣》。据古





代文献记载,《猎碣》之名最早出自唐窦泉《述书赋》的窦蒙注,其注云:“岐山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

唐太宗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勗曾有记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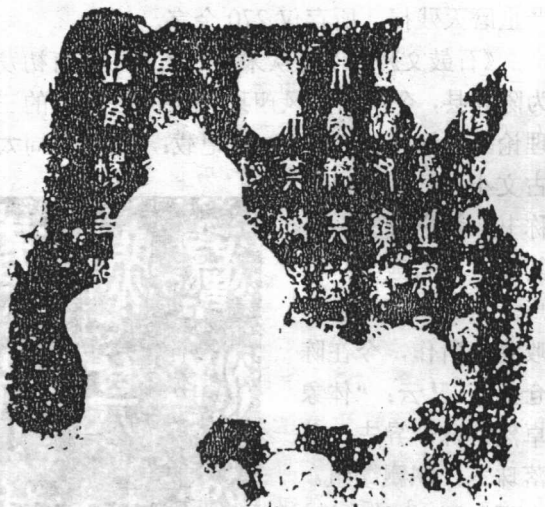


图5 石鼓文局部

籀之迹,近在关中,虞、褚、欧阳,共称古妙。虽岁久讹缺,遗迹尚有可观。而历代纪地理志者,不存记录,尤可叹息。”唐贞观、武周间书学家李嗣真在《书后品》中亦云:“史籀堙没,陈仓籍甚。”而记载得最为明确的则是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一代名相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天兴县志》,云:“石鼓文在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唐至德二年(757年)以雍县改名凤翔县,又分置天兴县,两县同城而治,故贞观时说雍县,此说天兴县。

遗憾的是,《石鼓文》在唐初被发现后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并不太有名,长期被“散弃于野”,直到后来,由于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大书法家都纷纷品鉴大加赞赏其古妙的书法,特别是大诗人、大文学家韦应物、杜甫、韩愈等竞相吟作《石鼓歌》等诗文对它大加揄扬,始显于世。其中尤其是韩愈的《石鼓歌》,对当时和后世影响甚大。其诗云: